

# 非正式政治力量：吉尔吉斯斯坦 “革命”反对派的动员基础\*

庄宏韬 曾向红

**【内容提要】** 吉尔吉斯斯坦自独立以来已发生了三次“革命”，广义来讲，这三次“革命”均属于“颜色革命”的范畴。但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在进行政治动员时，往往尚不具备其他“颜色革命”反对派发起政治动员的一系列“常见”条件（如发达的社交网络、强有力的政党、较高水平的青年组织等）。而在相关条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反对派依托何种力量实现高效的政治动员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为解答这一问题，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所掌握的三种非正式政治力量——个人政治关系网络、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传统政治习俗成为本篇文章重点考察的因素。在三次“革命”中，这三类非正式政治力量帮助反对派实现了募集资金、召集支持者、获取舆论支持、削弱政府合法性、策反政府高层官员等一系列政治目标，成为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主要依托。运用非正式政治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得以在其他相关条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于短时间内实现有效的政治动员，并最终达到了推翻现存政权的目的。

**【关键词】** 吉尔吉斯斯坦 政治动员 非正式政治力量 政权更迭  
国家稳定

**【作者简介】** 庄宏韬，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已经发生了三次“革命”，阿卡耶夫、巴基耶夫和热恩别科夫先后被“革命”所推翻。可以说，在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革命”的发生与政府的倒台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不过，与同一时期发生“颜色革

---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颜色革命’的发生、扩散与应对研究”（19BGJ051）的阶段性成果。

命”的其他国家相比，吉尔吉斯斯坦“革命”存在一点不同，即它的反对派在进行“革命”的政治动员时，往往并不具备发起动员的一系列“常见”条件（如发达的社交网络、强有力的政党、较高水平的青年组织等）。那么，在一系列“常见”条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吉反对派是依靠哪些力量实现政治动员的？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将有助于加深对独立以来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局势的理解，也有助于探寻吉尔吉斯斯坦频繁发生“革命”的原因，其不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也具有一定理论价值。

## 一 吉尔吉斯斯坦“革命”动员的独特性

“颜色革命”作为 21 世纪以来在欧亚大陆以及非洲地区颇具影响力的一种政治现象，被学界所广泛研究和关注<sup>①</sup>。一般来说，在“颜色革命”的相关国家中，反对派主要依托社交网络、政党、青年组织来进行政治动员，而且上述因素往往在相关国家“组合式”地出现。以格鲁吉亚发生的“玫瑰革命”为例，此次事件中，以联合民族运动党（United National Movement Party）、联合民主党（United Democrats Party）为代表的政党组织和以“卡马拉”（Kmara，意为“受够了”）为代表的青年组织均起到突出作用<sup>②</sup>；以乌克兰发生的“橙色革命”为例，此次事件中，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领导的“我们的乌克兰”党（Our Ukraine Party）和“博拉”（Пора，意为“是时候了”）青年组织均起到突出作用<sup>③</sup>；以突尼斯发生的“茉莉花革命”为例，此次事件中，社交网络发挥出突出作用<sup>④</sup>。以埃及发生的“一·二五革命”为例，此次事件中，穆斯林兄弟会（目前已更名为自由与公正党，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以及“四·六青年运

<sup>①</sup> 广义来讲，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发生的三次“革命”以及“阿拉伯之春”均可被纳入“颜色革命”的范畴。

<sup>②</sup> Giorgi Kandelaki, “Georgia’s Rose Revolution: A Participant’s Perspectiv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Vol. 167, 2006, p. 7; Tordjman Simon, “‘Surfing the Wave’: Civil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Colour Revolutions”, *Totalitarismus und Demokratie*, Vol. 5, No. 1, 2008, p. 56; 曾向红、连小倩:《从反对派与政府互动差异看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 年第 3 期。

<sup>③</sup> Ivan Katchanovski, “The Orange Evolution? The ‘Orange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Ukraine”, *Post-Soviet Affairs*, Vol. 24, No. 4, 2008, pp. 351-382; 宋博:《试论颜色革命冲击下转型国家青年政治组织的治理》,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 年第 1 期。

<sup>④</sup> 陈文胜:《“阿拉伯之春”中青年社交媒体参与及其启示》,载《当代青年研究》2017 年第 1 期。

动”“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等社交网络群体均发挥出突出作用<sup>①</sup>。

不过，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相关情况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社交网络、政党、青年组织等进行政治动员的“常见”条件在吉尔吉斯斯坦发展得并不充分。这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在进行政治动员时，其动员基础和动员过程与其他发生过“颜色革命”国家的反对派相比均存在很大不同。

第一，吉尔吉斯斯坦的社交网络发展水平不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吉尔吉斯斯坦在2005年大约有10.5%的人口是网民，在2010年大约有16.3%的人口是网民，此后，吉尔吉斯斯坦的网民数量开始迅速攀升，至2017年已有38%的人口是网民（但同期突尼斯的网民占总人口比重已超过55%）<sup>②</sup>。即使网民数量在2010年后得到了快速增加，吉尔吉斯斯坦的社交网络发展仍然未能达到较高水平。至2017年年底，吉尔吉斯斯坦的Facebook用户大约有65万左右，Twitter用户大约有55万左右<sup>③</sup>。而且在吉尔吉斯斯坦使用社交网站的人群中，很少形成富有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的社交团体，对三次“革命”产生影响的社交网络团体更是少见。此外，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固定宽带普及率仅为4.04%，通信基础设施指数仅为0.3418<sup>④</sup>。总体来说，吉尔吉斯斯坦在独立后，其网络建设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近年来虽然有较大提升，但尚未达到足以形成具有足够组织能力的社交网络团体的程度。

第二，吉尔吉斯斯坦的反对派政党相对羸弱。由于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建设起步较晚，且政府对反对派长期进行打压，所以吉反对派政党十分羸弱，其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十分有限。这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反对派缺乏有号召力的政治纲领，这意味着反对派无法利用政治纲领来获取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其次，反对派的政党建设并不成功，其政党规模往往很小，也没有很完备的组织系统，力量十分分散，这意味着，反对派的政党没有足够组织能力，当反对派将要发起政治运动时，往往不能利用政党力量实现有效动员；再次，反对派所掌握的

① 杨恕、宛程：《“一·二五革命”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发展趋势》，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1期；周明、曾向红：《埃及“一·二五革命”中的信息瀑布与虚拟社交网络》，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2期；曾向红、杨恕：《中东变局的发展过程、动力与机制研究——以埃及变局为中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期。

② 世界银行网站，<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IT.NET.USER.ZS?locations=KG>

③ 值得注意的是，社交网站的网民数量是随时发生巨大变化的，这受到社交网站所属公司的运营状况的影响，2016年年底吉尔吉斯斯坦的Facebook用户数量曾一度突破150万，但2017年年底降至65万。数据来源：<https://napoleoncat.com/stats/social-media-users-in-kyrgyzstan/>

④ 郭曼若：《中亚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现状、挑战及与中国的合作》，载《欧亚经济》2021年第1期。

政府职位较少，特别是在历次“革命”前夕，主要的高层政治岗位几乎全为亲总统派所把控，而反对派此前所占据的政府高层位置则先后失去，这意味着反对派的政治行动很难获得政府高层的支持；最后，反对派政党既不掌握武装力量，也缺乏资金，这意味着反对派所掌握的物质力量也十分有限。总之，吉尔吉斯斯坦的反对派政党相对羸弱，这使得他们在政治运动发生时很难起到主导作用。

第三，吉尔吉斯斯坦的青年组织建设尚不完善。在吉尔吉斯斯坦三次“革命”中，作用较为突出的青年组织当属“凯尔凯尔”（Kel - Kel），该组织于2005年成立，其对于“郁金香革命”的进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不过，“凯尔凯尔”组织规模仍然十分有限<sup>①</sup>，并且在“郁金香革命”后便很快解散。而此后无论是“二次革命”还是“2020年政治运动”，都鲜有青年组织能在其中发挥作用。总体来看，吉尔吉斯斯坦青年组织的建设水平不高，规模有限，即使有个别青年组织对政治局势产生影响，也会很快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综上所述，在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其社交网络、青年组织、政党等要素的建设和发展水平并不高，这使得反对派在准备发起“革命”时，往往不能将上述力量作为主要的动员基础。这就引出了本文的问题：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是依托什么力量发动革命的，又是怎样依托这些力量进行政治动员的？对于这一问题，本文尝试从“非正式政治力量”的视角，通过分析个人政治关系网络、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传统政治习俗三种力量在吉尔吉斯斯坦“革命”中的作用来进行解答。本文认为，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虽然不具备其他“颜色革命”国家发起政治运动的一系列“常见”条件，但由于反对派掌握着较为强大的非正式政治力量，因此仍拥有足够资源来完成政治运动的动员工作。通过对非正式政治力量的运用，反对派在面临一系列不利条件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募集资金、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压力、争取政治合法性、博取基层力量的支持，从而实现了高效的政治动员。

本文将通过非正式政治力量来对吉反对派的动员基础进行考察。首先，界定非正式政治力量的含义，之后分别对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所掌握的三种主要非正式政治力量（个人政治关系网络、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传统政治习俗）进行梳理；然后，以吉尔吉斯斯坦发生过的三次“革命”作为案例，对反对派运用

---

<sup>①</sup> 根据阿利舍尔·哈米多夫（Alisher Khamidov）的研究，“凯尔凯尔”组织仅仅拥有300名成员，并且很快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参见：Alisher Khamidov, “Kyrgyzstan’s Revolutionary Youth”, *The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6, No. 2, 2006, p. 86.

三种非正式政治力量进行政治动员的过程进行论述；最后，对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运用非正式政治力量进行政治动员的机制进行归纳。

## 二 反对派政治动员的基础——三种非正式政治力量

现实的政治运行是复杂多样的。在正式的制度安排之外，往往存在着其他的能够对政治运行产生重要影响的力量。对于这些游离于正式制度安排之外的政治力量，学界早有研究。但对于如何命名和定义这种政治力量，学界存在不同观点（见表1）。为了明确定义、方便本文的研究，在综合考察过往研究成果的前提下，本文以“非正式政治力量”来命名这种“游离于正式制度安排之外的能够影响政治发展的力量”，并将非正式政治力量界定为：既不依托政府、议会、政党、法律、军队等官方性的政治组织或机构，也不依托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政权或武装力量，却仍能够对政治运作产生影响的权力或政治资源<sup>①</sup>。

表1 “非正式政治力量”及其类似概念在其他文献中的不同称谓及定义

文献作者	称谓	定义
福井春弘	非正式政治	通常而言，规则和制度往往不是由权威机构故意创造的，它们只是单纯地（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演进成了“习俗和行为准则”，而这种由非正式规则和制度所支配的政治就是非正式政治 <sup>②</sup> 。
罗德明 (Lowell Dittmer)	非正式政治 (informal politics)	从行为上看，非正式政治由基于价值理性而非目的理性的关系组成，这种关系是为个人服务的。非正式政治倾向于含蓄的和隐蔽的，而非显性的和公开的，非正式政治是灵活的、随意的、无规律的，而不是制度化的。从结构上看，非正式政治可能比常规行政部门更能影响领导，并可能比下级更容易影响上级领导……从周期标准来看，非正式政治往往发生在结构崩溃最可能发生的时候 <sup>③</sup> 。
拉德尼兹 (Scott Radnitz)	非正式政治 (informal politics)	塑造政治行为和结果并为之提供基础的非正式性（因素） <sup>④</sup> 。

①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割据政权虽然不为官方政府或国际社会所承认，但其所拥有的政党、地方武装等力量仍然属于正式的政治力量。

② Haruhiro Fukui, “Introductio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Informal Politics”, in Lowell Dittmer, Haruhiro Fukui and Peter N. S. Lee, eds., *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

③ Lowell Dittmer, “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34, July 1995, p. 33.

④ Scott Radnitz, “Review Article: Informal Politics and the State”,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3, No. 3, 2011, p. 354.

古德费勒 (Tom Goodfellow)	政治的非正式性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非正式性作为一个普遍的概念已经被无数次的定义。在这里，我赞同林德尔（的观点），将那些在某些方面“超越或规避国家监管”的活动归类为非正式活动 <sup>①</sup> 。
赫尔默克、莱维斯基 (Gretchen Helmke and Steven Levitsky)	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是指在官方认可的渠道之外创造、交流和执行的社会共享规则，这一规则通常是不成文的 <sup>②</sup> 。
劳斯 (Hans – Joachim Lauth)	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是没有正式编入宪法或法律的制度 <sup>③</sup> 。
克里斯蒂安森 (Christiansen)	非正式治理	当参与决策的过程尚未（或无法）形成法律条文并公开地强制执行时，治理就是非正式的 <sup>④</sup> 。
哈什 (Matthew Harsh)	非正式治理	非正式治理是指一种没有编入法律的、非制度性的决策手段，其中社会关系和影响力的网络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非正式治理也包括发生在各级非政府组织内部或由各级非政府组织领导的决策 <sup>⑤</sup> 。
特米尔库洛夫 (Azamat Temirkulov)	非正式行为体	作为一个术语，“非正式行为体”用来描述庇护网络和非官方地组织起来的人群 <sup>⑥</sup> 。

对于本文的研究来说，非正式政治力量这一概念具有较强的契合性。在吉尔吉斯斯坦历次“革命”中，反对派所能掌握的正式政治力量十分有限，因此其进行政治动员的主要基础来自于非正式政治力量。这一概念既能说明反对派的动员基础是一种政治力量，也能说明这种政治力量的非正式性。而其他的类似概念则起不到这种效果。在考察了相关概念的内涵以及本文研究问题的特点后，文章最终选取“非正式政治力量”一词来描述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在进行政治动员过程中所依托的力量。

① Tom Goodfellow, “Political Informality: Deals, Trust Networks, and the Negotiation of Value in the Urban Realm”,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56, No. 2, 2020, p. 280.

② Gretchen Helmke and Steven Levitsky,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 Research Agenda”,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2, No. 4, December 2004, p. 727.

③ Hans – Joachim Lauth,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CPR Joint Sessions, Uppsala, p. 5.

④ Thomas Christiansen, Andreas Follesdal and Simona Piattoni, “Informal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 Introduction”, in Thomas Christiansen and Simona Piattoni, eds., *Informal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3, p. 6.

⑤ Matthew Harsh, “Informal governance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Africa”, in Thomas Christiansen and Christine Neuhold,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Informal Governanc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2, p. 481.

⑥ Azamat Temirkulov, “Informal Actors and Institutions in Mobilization: the Periphery in the ‘Tulip Revolution’”,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27, Nos. 3 – 4, September – December 2008, p. 317.

在对非正式政治力量进行界定后可以发现，非正式政治力量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运行产生着巨大作用，且这种非正式政治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为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所掌握和利用。在吉尔吉斯斯坦三次“革命”中，反对派主要是利用了个人政治关系网络、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传统政治习俗这三支非正式政治力量，才得以在种种不利条件下仍然高效地完成了政治动员。

### （一）个人政治关系网络

个人政治关系网络主要是指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利用其从政经历或社会关系而发展出来的为自己政治需求服务的资源或力量。在吉尔吉斯斯坦历次反政府运动中，反对派领导人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均发挥出显著的影响（关于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政治人物，可以见表2）。根据斯科特·拉德尼茨（Scott Radnitz）的研究，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运动的动员主要受政治领导人的影响，政治家有能力利用他们与当地的非正式联系，来动员对他们个人的支持<sup>①</sup>。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政坛上涌现出了诸多知名的反对派人物，他们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对于反对派的政治动员起到巨大的帮助作用。

1. 菲利克斯·库洛夫（Felix Kulov），“郁金香革命”和“二次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曾先后任吉尔吉斯斯坦内政部长、副总统、楚河州州长、国家安全部部长、比什凯克市市长、政府总理等职务，并创立了吉尔吉斯斯坦尊严党。库洛夫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来自于四个方面：（1）政治伙伴；（2）家族成员；（3）乡党；（4）民间支持者。首先，库洛夫在其从政的四十多年时间中，结识了大量政治伙伴，其中埃米尔·阿利耶夫（Emil Aliev）、詹尼别克·巴赫切耶夫（Djanybek Bakhchiev）和尤森·库达贝格涅诺夫（Usen Kudaibergenov）等人与库洛夫关系尤其密切，这些政治伙伴无疑能为库洛夫的政治活动提供诸多助力。其次，家族成员对于库洛夫政治活动的帮助也不容忽视。库洛夫的父亲沙申白·库洛夫（Sharshenbai Kulov）参加过卫国战争，在执法机构工作，后来以上校军衔退休<sup>②</sup>。库洛夫早期的政治经历之所以能够一帆风顺，与其家庭的帮助不无关系。再次，库洛夫的故乡拜尔提克也有大量库洛夫的支持者。在库洛夫被捕期

<sup>①</sup> Scott Radnitz,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Kyrgyzst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7, No. 2. Cited in Sally N. Cummings and Maxim Ryabkov, “Situating the ‘Tulip Revolution’”,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27, Nos. 3-4, September-December 2008, p. 246.

<sup>②</sup> “Biography of Felix Kulov”, The Political Party of Kyrgyzstan Ar - Namys, March 17, 200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50223074634/>

间，拜尔提克村的村民在比什凯克多次组织了抗议活动，图森·朱玛卡诺娃（Tursun Jumakanova）、萨达特·桑托罗娃（Saadat Santorova）等人均参加了抗议活动并接受了采访，他们表示，拜尔提克村的抗议活动已经导致政府派出安全部队对其进行监视<sup>①</sup>。最后，库洛夫本人在社会上也颇有威望，一些人出于对他的尊敬而支持他。在库洛夫被捕入狱后，2000 年、2002 年和 2004 年均均有数百乃至上千的库洛夫支持者在比什凯克进行集会，为库洛夫声援<sup>②</sup>。在这些抗议活动中，当然有库洛夫的政治伙伴、乡党和族人参与，但那些慕名而来的支持者也为数不少。综上所述，库洛夫拥有强大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这种非正式政治力量使得他在关键的政治时刻，可以争取到很多高层政客以及数千底层支持者的支持，从而形成广泛而高效的政治动员，在“郁金香革命”和“二次革命”期间，库洛夫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均发挥出重要作用。

2. 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Kurmanbek Bakiyev），“郁金香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与库洛夫不同，巴基耶夫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主要建立在部族、家族和政客的支持之上。巴基耶夫属于泰伊特家族，该家族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很有影响力<sup>③</sup>。在“郁金香革命”中，巴基耶夫利用自己属于南方部族的身份，煽动南方部族民众参与政治运动，从而集结起数千人的抗议队伍，给政府以巨大压力。巴基耶夫的家族在奥什市很有影响力。巴基耶夫的父亲萨利·巴基耶夫（Sali Bakiev）在苏联时期曾任当地集体农场的主席。巴基耶夫的妻子塔季扬娜·巴基耶娃（Tatyana Bakiyeva）在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主管莫里姆（Meerim）基金会楚河州区域的分支机构，并在此期间与阿卡耶夫的夫人梅拉姆·阿卡耶娃（Mayram Akayeva，莫里姆基金会的创立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巴基耶夫在“郁金香革命”之前即有过长期的从政和经营企业的经历。这些经历帮助巴基耶夫结识了一批政客和企业家，并最终在“郁金香革命”期间发挥了作用。阿布斯马特·马萨利耶夫（Absamat Masaliyev）是巴基耶夫的政治伙伴中比较知名的

<sup>①</sup> Sultan Jumagulov, “Kyrgyzstan: Punished by Association”, Institute for War and Peace Reporting, February 21, 2005. <https://iwpr.net/global-voices/kyrgyzstan-punished-association>

<sup>②</sup> “Kyrgyz Report: April 5, 2000”,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April 5, 2000, <https://www.rferl.org/a/1343593.html>; Antoine Blua, “Kyrgyzstan: Protesters Demand Kulov’s Release, President’s Resignation”,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May 9, 2002. <https://www.rferl.org/a/1099649.html>. Aisha Aslanbekova, “Disrupted March in Support of Felix Kulov”, The Central Asia – Caucasus Analyst, April 21, 2004.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field-reports/item/8938-field-reports-caci-analyst-2004-4-21-art-8938.html>

<sup>③</sup> Informal Governance and Corruption – Transcending the Principal Agent and Collective Action Paradigms – Kyrgyzstan Country Report Part 2 Micro – Level, p. 7.



一个，根据罗扎·奥通巴耶娃（Roza Otunbayeva）的说法，在“郁金香革命”爆发的三年前，吉尔吉斯斯坦政界的“元老”、来自南部的国会议员马萨利耶夫非正式地指定巴基耶夫为下一届总统候选人<sup>①</sup>。一些政治人物，比如尤森·西迪科夫（Usen Sydykov）承诺在马萨利耶夫死后服从他的命令，并在“郁金香革命”中支持巴基耶夫<sup>②</sup>。

3. 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Almazbek Atambayev），吉尔吉斯斯坦老牌政党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三次“革命”中，阿坦巴耶夫均发挥出重要作用。阿坦巴耶夫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来自于三个方面：（1）政治伙伴；（2）民间支持者；（3）私人武装。首先，阿坦巴耶夫在数十年的从政生涯中，结识了一大批政治伙伴。阿卜迪甘尼·艾尔克巴耶夫（Abdygany Erkebaev）、奥通巴耶娃、巴克伊特·贝西莫夫（Bakyt Beshimov）、卡内别克·伊萨科夫（Kanybek Isakov）、库尔马托夫（Kubanychbek Kulmatov）、伊琳娜·卡拉姆什金娜（Irina Karamushkina）、昆都士·焦尔杜巴耶娃（Kunduz Zholdubaeva）等人是阿坦巴耶夫比较重要的政治伙伴。其次，阿坦巴耶夫自己也能够通过其个人的政治主张或人格魅力收获大量的民间支持者。在三次“革命”中，阿坦巴耶夫均利用其个人号召力集合了数千支持者进行游行示威。最后，在阿坦巴耶夫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中，有一支相对特殊的力量，即阿坦巴耶夫的私人武装。在阿坦巴耶夫从政期间，其儿子塞伊特·阿坦巴耶夫就暗中购买武器，形成了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力量。在2019年热恩别科夫命令国家安全部队逮捕阿坦巴耶夫时，阿坦巴耶夫的私人武装一度对国家安全部队的行动进行阻击，并造成了安全部队的伤亡。

4. 萨德尔·扎帕罗夫（Sadyr Japarov），吉尔吉斯斯坦2020年政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他之所以能够在2020年政治运动中东山再起并迫使热恩别科夫下台，所依靠的主要是他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这种个人政治关系网络主要有三个来源：（1）政治伙伴；（2）民间支持者；（3）企业家。首先，扎帕罗夫在其从政以及领导“阿塔·楚特”党（Ata Zhurt Party）、爱国党（Patriotic Party）期间，结识了大量政治伙伴。塔西耶夫（Kamchybek Tashiev）、马米托夫（Talent Mamytoy）等人是扎帕罗夫最重要的政治伙伴，他们成为扎帕罗夫继续动员支持

<sup>①</sup> Erica Marat, *The Tulip Revolution: Kyrgyzstan One Year After*, Washington D. C. :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2006, p. 115.

<sup>②</sup> Ibid.

者以及东山再起的重要因素。其次，扎帕罗夫一直以民族主义者著称，这一民族主义者身份为其获取了大量支持者。2012 年和 2013 年，扎帕罗夫以库姆托尔金矿国有化为口号，先后召集支持者在库姆托尔金矿进行抗议活动，这两次抗议活动均有数百名支持者参加。最后，扎帕罗夫曾先后担任索顿库尔农场负责人、科尔戈依石油公司董事、古泽尔和努尔耐夫特盖兹炼油厂负责人等职位。早期的商业活动使扎帕罗夫能够结识相当数量的企业家，在拓展扎帕罗夫社会人脉的同时，也扩大了其政治影响力，并方便其有更多途径来募集资金。

5. 除上述主要政治人物外，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历次“革命”中，都会出现一些地方上的反对派人物，他们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虽然不及前面提到的反对派领导人那样庞大，但也能在政治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阿卜萨马特·马萨利耶夫 (Absamat Masaliyev)<sup>①</sup>、奥穆别克·特克巴耶夫 (Omurbek Tekebayev)<sup>②</sup>、阿兹姆别克·别克纳扎罗夫 (Azimbek Beknazarov)<sup>③</sup>、巴亚曼·埃尔金巴耶夫 (Bayaman Erkinbayev)<sup>④</sup>、詹尼什别克·纳扎拉利耶夫 (Jenishbek Nazaraliev)<sup>⑤</sup>、

① 马萨利耶夫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前的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他领导着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在“郁金香革命”中，马萨利耶夫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巴基耶夫成为总统。参考：Erica Marat, *The Tulip Revolution: Kyrgyzstan One Year After*, Washington D. C.: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2006, p. 115.

② 特克巴耶夫是“阿塔·梅肯”党（又称祖国党，Ata Meken Party）的主要创始人，他与阿兹姆别克·别克纳扎罗夫 (Azimbek Beknazarov)、梅利斯·埃诗玛卡诺夫 (Melis Eshimakanov)、库巴特贝克·贝博洛夫 (Kubatbek Baibolov) 等人都有比较密切的政治联系，三次“革命”中均有特克巴耶夫或其支持者的参与。参见：“Who’s Who in Kyrgyz Politics”，Geohistory, September 26, 2017. <https://geohistory.today/kyrgyz-politics-whos-who/>; Erica Marat, “Kyrgyz NGOs Call on Government to Fight Organized Crime”,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Global Research & Analysis, April 11, 2006.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kyrgyz-ngos-call-on-government-to-fight-organized-crime/>; Jim Nichol, “The April 2010 Coup in Kyrgyzstan and its Aftermath: 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for U. S. Interest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June 15, 2010.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t&ret=j&q=&esrc=s&source=web&cd=&cad=rja&uact=8&ved=2ahUKEwiNm\\_2p0qjwAhXzdc0KHUT\\_AkEQFjAAegQIBBAD&url=https%3A%2F%2Ffas.org%2Fsgp%2Fers%2Frow%2FR41178.pdf&usq=A0vVaw0Ca3bAobn4bXFZhdNNs261](https://www.google.com/hk/url?sa=t&ret=j&q=&esrc=s&source=web&cd=&cad=rja&uact=8&ved=2ahUKEwiNm_2p0qjwAhXzdc0KHUT_AkEQFjAAegQIBBAD&url=https%3A%2F%2Ffas.org%2Fsgp%2Fers%2Frow%2FR41178.pdf&usq=A0vVaw0Ca3bAobn4bXFZhdNNs261)

③ 早在 2002 年，别克纳扎罗夫即召集其支持者进行了一场反对阿卡耶夫的抗议活动，这一抗议活动被称为“阿克西事件”，成为日后“郁金香革命”的导火索。参见：Martha Brill Olcott, “Lessons of the Tulip Revolut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7, 2005.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05/04/07/lessons-of-tulip-revolution-pub-16758>

④ 埃尔金巴耶夫是一名有着黑社会背景的商人，他供养着一大批拳击手、摔跤手，并创立了艾利什 (Alysh) 搏击协会来给这些拳击手和摔跤手提供工作，在“郁金香革命”中，埃尔金巴耶夫的搏击协会以及下面的拳击手和摔跤手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大约两千名拳击手和摔跤手被动员起来参与了游行示威。参考：Alexander Kupatadze, “Organized Crime before and after the Tulip Revolution: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Upperworld – underworld Networks”, in Sally N. Cummings, edi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Kyrgyzstan’s ‘Tulip Revolution’: Motives, Mobilization and Meaning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 63.

⑤ “郁金香革命”期间，纳扎拉利耶夫动员了七千多支持者进行游行示威活动。参见：David Gullette, *The Genea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Kyrgyz Republic: Kinship, State and “Tribalism”*, Global Oriental, 2010, p. 26.

乌尔纳特别克·巴里克塔巴索夫 (Urmatbek Baryktabasov)<sup>①</sup>、奥穆别克·巴巴诺夫 (Omurbek Babanov)<sup>②</sup>、阿达汉·马杜马罗夫 (Adahan Modumarov)<sup>③</sup>、卡姆奇别克·塔西耶夫 (Kamchybek Tashiev)<sup>④</sup> 等人是这类反对派人物的典型代表。这些政治人物通过对其个人政治关系网络的运用，同样动员起大量的支持者对“革命”进行声援，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吉尔吉斯斯坦“革命”的进程。

表 2 文中主要政治人物简介<sup>⑤</sup>

政治人物	主要任职经历 <sup>⑥</sup>	备注
阿斯卡尔·阿卡耶夫 (Askar Akayev, 1944. 11. 10 ~)	1990. 10 ~ 1991. 10: 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 1991. 10 ~ 2005. 4: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吉尔吉斯斯坦首任总统，“郁金香革命”中下台，之后前往俄罗斯担任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
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 (Kurmanbek Bakiyev, 1949. 8. 1 ~)	1995 ~ 1997: 贾拉拉巴德州州长 1997 ~ 2000: 楚河州州长 2000 ~ 2002: 总理 2005. 3 ~ 2010. 4: 总统	“郁金香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吉尔吉斯斯坦第二任总统，“二次革命”中下台。

① “郁金香革命”期间，巴里克塔巴索夫的支持者冲进比什凯克的一座政府大楼，抗议他被排除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之外。参见：David Gullette, *The Genea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Kyrgyz Republic: Kinship, State and “Tribalism”*, Global Oriental, 2010, p. 27.

② 巴巴诺夫是一名商人，他曾参加总统选举并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巴巴诺夫在“郁金香革命”和“二次革命”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Background on Omurbek Babanov”,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anuary 17, 2012.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2/01/17/background-on-omurbek-babanov-pub-46487>

③ 马杜马罗夫是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政治家，“团结吉尔吉斯斯坦”党 (United Kyrgyzstan Party) 的领导人，他在阿卡耶夫时期就以对总统的尖锐批评而闻名，“郁金香革命”中马杜马罗夫组织起了数千人的抗议队伍，但此后马杜马罗夫的政治生涯并不顺利，他先后与阿坦巴耶夫、塔西耶夫、热恩别科夫、扎帕罗夫等人竞争总统职位，均遭到失败。参见：Erica Marat, “Tulips Bloom in Kyrgyzstan Bringing Hopes for Democratic Development”, *Eurasia Daily Monitor*, March 28, 2005.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tulips-bloom-in-kyrgyzstan-bringing-hopes-for-democratic-development/>; “Madumarov Submits Documents to 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as Self-nominated Candidate for President of Kyrgyzstan”, AKIPRESS, October 30, 2020. [https://akipress.com/news/650383:Madumarov\\_submits\\_documents\\_to\\_Central\\_Election\\_Commission\\_as\\_self-nominated\\_candidate\\_for\\_President\\_of\\_Kyrgyzstan/](https://akipress.com/news/650383:Madumarov_submits_documents_to_Central_Election_Commission_as_self-nominated_candidate_for_President_of_Kyrgyzstan/)

④ 塔西耶夫是扎帕罗夫的重要政治伙伴，“阿塔·楚特”党 (Ata-Zhurt Party) 和爱国党 (Patriotic Party) 的领导人。2012年，他与扎帕罗夫一起参加了要求库姆托尔金矿国有化的游行示威活动，并在此次活动后与扎帕罗夫一起被阿卡耶夫当局抓捕，2020年政治运动爆发后，他与扎帕罗夫一起被释放，随后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成为扎帕罗夫就任总统的得力助手。参见：“Opposition Leaders Jailed”, April 10, 2013. [http://country.eiu.com/article.aspx?articleid=840361868&Country=Kyrgyz%20Republic&topic=Politics&\\_8](http://country.eiu.com/article.aspx?articleid=840361868&Country=Kyrgyz%20Republic&topic=Politics&_8); Adam Hug, “Retreating Rights - Kyrgyzstan: Introduction”, March 1, 2021. <https://ipc.org.uk/retreating-rights-kyrgyzstan-introduction/>

⑤ 该附录基本按照政治人物所担任的最高职务的级别大小进行排列。

⑥ 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职务。

罗扎·奥通巴耶娃 (Roza Otunbayeva, 1950. 8. 23 ~)	1992: 外交部长和副总理 1992 ~ 1994: 驻美国、加拿大等国 大使 1994 ~ 1997: 外交部长 1997 ~ 2002: 驻英国大使 2002 ~ 2004: 联合国秘书长格鲁吉亚 维和特派团副特别代表 2005. 3 ~ 2005. 9: 代理外交部长 2010. 4 ~ 2010. 7: 代理总统 2010. 7 ~ 2011. 12: 总统	“郁金香革命”和“二次革命” 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 (Almazbek Atambayev, 1956. 9. 17 ~)	2005. 12 ~ 2006. 4: 工业、贸易、旅游 部长 2007. 3 ~ 2007. 11: 总理 2010. 10 ~ 2011. 10: 总理 2011. 10 ~ 2017. 11: 总统	“郁金香革命”“二次革命”和 2020 年政治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之一。
索隆拜·热恩别科夫 (Sooronbay Jeenbekov, 1958. 11. 16 ~)	2017. 10 ~ 2020. 10: 总统	原为阿坦巴耶夫的政治伙伴, 后 成为阿坦巴耶夫的主要政治对手, 2020 年政治运动中下台。
萨德尔·扎帕罗夫 (Sadyr Japarov, 1968. 12. 6 ~)	2020. 10 ~ 2020. 11: 代理总理、代理 总统 2021. 1 至今: 总统	最初为巴基耶夫的支持者, 后为 阿坦巴耶夫的主要政治对手, 2020 年政治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之一。
费利克斯·库洛夫 (Felix Kulov, 1948. 10. 29 ~)	2005. 9 ~ 2006. 12: 总理	尊严党创始人, “郁金香革命” “二次革命”主要领导者之一。
阿布萨马特·马萨利耶夫 (Absamat Masaliyev, 1933. 4. 10 ~ 2004. 7. 31)	1985. 11 ~ 1990. 4: 苏联吉尔吉斯共和 国第一书记 1990. 4 ~ 1990. 12: 苏联吉尔吉斯共和 国最高苏维埃主席	苏联时期吉尔吉斯共和国第一书 记, 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创 始人和主要领导者, 后期支持巴 基耶夫。
卡姆奇别克·塔西耶夫 (Kamchybek Tashiev, 1968. 9. 27 ~)	2020. 11 至今: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扎帕罗夫的主要政治伙伴, 2020 年政治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阿卜迪甘尼·艾尔克巴耶夫 (Abdygany Erkebaev)	1993 ~ 1999: 社会民主党党魁 国家科学院院长	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 阿坦巴 耶夫的主要政治伙伴。
阿齐姆别克·别克纳扎罗夫 (Azymbek Beknazarov)	总检察长	埃尔金巴耶夫的主要政治伙伴, “阿克西事件”的主要领导者。
埃米尔·阿利耶夫 (Emil Aliev, 1954. 10. 8 ~)	尊严党副主席	库洛夫的主要政治伙伴, “郁金香 革命”、“二次革命”的主要领导 者之一。
詹尼别克·巴赫切耶夫 (Djanybek Bakhchiev)	1997 ~ 2000: 国家安全部反恐小组负 责人	库洛夫的主要政治伙伴, “郁金香 革命”的参与者。

巴亚曼·埃尔金巴耶夫 (Bayaman Erkinbayev, 1967. 9. 22 ~ 2205. 4. 28)	搏击协会领导者, 国会议员	别克纳扎罗夫的主要政治伙伴, “郁金香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2005年4月28日被暗杀
尤森·西迪科夫 (Usen Sydykov)	2006 ~ 2008: 总统顾问	巴基耶夫的主要政治伙伴, “郁金香革命”主要参与者。
阿达汉·马杜马罗夫 (Adahan Modumarov, 1965. 9. 3 ~ )	国会议员	“郁金香革命”的主要参与者, 先后与阿坦巴耶夫、热恩别科夫、扎帕罗夫竞争总统职位。
钦吉兹·艾特马托夫 (Chinghiz Aitmatov, 1928. 12. 12 ~ 2008. 6. 10)		吉尔吉斯斯坦著名作家, 推举阿卡耶夫成为吉尔吉斯斯坦首任总统的关键人物。

## (二) 部族认同及部族群体

部族作为一种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并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群体性概念, 被学界所广泛关注和研究。目前, 关于部族的定义, 学界仍然处于广泛的争论之中。本文采用牛津网络词典的定义, 将部族定义为由家庭或是社会、经济、宗教、血缘等共同体所组成的, 具有共同的文化和方言, 通常具有公认领导者的社会形态<sup>①</sup>。由部族这一概念而引申出来的部族主义和部族政治等相关概念, 也在诸多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吉尔吉斯语中, 吉尔吉斯斯坦的本意便是“四十个部落所组成的国家”。所以, 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发展过程中, 部族认同及部族群体的影响必然十分深远。如今, 吉尔吉斯斯坦就部族结构状况而言, 主要分为三大集团, 即左翼、右翼以及伊奇基利克<sup>②</sup>。抑或按照地理位置, 可以将吉尔吉斯斯坦的部族分为由北部和西部部落组成的左联盟与由南部部落组成的右联盟, 即北方部族与南方部族。所谓的北方部族基本位于楚河州 (Chui Oblast)、伊塞克湖州 (Issyk - Kul Oblast)、纳伦州 (Naryn Oblast) 和塔拉斯州 (Talas Oblast), 而所谓的南方部族基本位于巴特肯州 (Batken Oblast)、贾拉拉巴德州 (Jalal - Abad Oblast) 和奥什州 (Osh Oblast)。这些部落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地理因素: 一个巨大的山脉将吉尔

<sup>①</sup> 资料来源: <https://languages.oup.com/google-dictionary-en/>

<sup>②</sup> 左翼部族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和西部的平原地区, 主要包括萨雷巴噶什、布库、塔盖伊、萨勒斯、萨雅克、琼巴噶什、巴塞孜等七个分支, 右翼部族位居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山地地区, 主要包括库什楚、萨雷蒙杜兹、热塔格、启台、巴塞克等部, 伊奇基利克由众多小部落组成, 大致包括基普恰克、乃曼、太伊特、凯塞克、热凯塞克、博斯敦、诺伊霍特、阿瓦特等。参见焦一强:《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9年, 第199页。

吉斯斯坦划分为北部和南部，长期以来使这两个区域之间的通讯和运输变得困难，从而造成了明显的文化差异。北部比较发达富裕，并且倾向于与俄罗斯和西方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南部人口众多，更多信奉传统伊斯兰价值观。部族政治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影响十分深远，并主要体现为个人认同、社会关系、政治生活三个方面。

在个人认同方面，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起到界定身份、凝聚族群的作用。由于吉尔吉斯斯坦特殊的历史因素，吉尔吉斯人对于本部族的认同度很高，这种认同度甚至挑战到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度。在历史上，吉尔吉斯民族一直没有中央政府，各地居民都是由所在部族统治。正如朱拉耶夫（Shairbek Juraev）所说，“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北部和南部部落都卷入了持续的内部冲突，而此时并没有一个权威的中央政府值得他们尊重。吉尔吉斯人在历史上也没有发展出对领土或人民行使政治权力的做法，也没有特定的部落获得对其他部落的权力，此外，从来没有制定过对所有人平等适用的正式法律。”<sup>①</sup> 因此，直到今天，有些吉尔吉斯人仍然选择通过建立血统协会来加强本部族的联系，这些协会对日常生活以及国家政治产生幕后影响<sup>②</sup>。即使对自己原本的血统并不很清楚的吉尔吉斯人，也倾向于用南方部族和北方部族来划分自己的身份。

在社会关系方面，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本部族成员经常会举行内部聚会，以联络感情、商讨生活和社会事宜。在一些部族内部也会形成严格的规定，以约束自己的族人。本部族成员之间的感情往往很深厚，他们会被提醒“同一部族的成员，不应该背叛彼此”，以及“我们是亲戚，应该相互支持”<sup>③</sup>。伊兹马义别科娃（Aksana Ismailbekova）在其一篇文章中以彻里克（Cherik）家族的一次内部聚会为例，详细地描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部族生活与部族文化。在这次聚会中，大约 80 多人历时 14 小时前往阿拉布卡（Ala - Buka），以进行即将到来的家族聚会，聚会的气氛十分热烈，人们在聚会中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交流<sup>④</sup>。

---

<sup>①</sup> Shairbek Juraev, “Kyrgyz Democracy? the Tulip Revolution and Beyond”,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27, Nos. 3 - 4, 2008, p. 260.

<sup>②</sup> “Kyrgyzstan Lineage Associations and Informal Politics”. <https://eurasianet.org/kyrgyzstan-lineage-associations-and-informal-politics>

<sup>③</sup> Aksana Ismailbekova, “Informal Governance and Corruption - Transcending the Principal Agent and Collective Action Paradigms: Kyrgyzstan Country Report, Part 2, Micro - Level”, *Basel Institute on Governance*, 2018, p. 6.

<sup>④</sup> Aksana Ismailbekova, “Lineage Associations in Kyrgyzstan”, January 4, 2018. <http://thecessblog.com/2018/01/lineage-associations-in-kyrgyzstan-by-aksana-ismailbekova/>

在政治生活方面，部族政治通过影响议会和总统选举，将部族的烙印深深地打在了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上。基于部族的组织拥有巨大权力，有能力动员选民、影响政客并组织抗议活动。从本质上讲，它们可以充当游说团体，甚至深入到地方和地区机构的基本政党。萨里巴吉什（Sarybagysh）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它在2014年夏季举行的忽里勒台（Kurultai）吸引了450名代表，其中包括公众人物、企业家、国会议员、历史学家和本部族长者。此外，巴基耶夫下台后，吉尔吉斯斯坦曾经有一波各地部族召开大会的风潮。2014~2016年，泰伊特（Teiyt）家族、萨里巴伊什（Sarybagysh）家族和彻里克（Cherik）家族先后在列依列克（Leilek）区、伊塞克湖（Issyk-Kul）区和阿拉布卡（Ala-Buka）区进行集会，选举家族领袖<sup>①</sup>。很多政府官员也出席这些部族会议，使这些部族会议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总之，在个人认同、社会关系、政治生活等方面，吉尔吉斯斯坦深受部族主义的影响，这使得反对派具备了利用部族认同和部族群体进行政治动员的可能。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随着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的研究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吉尔吉斯斯坦的部族政治进行了研究和论述。在有关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研究的文献中，有相当数量的文献指出了部族政治对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治的影响。在三次反政府运动中，反对派均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族群矛盾，他们以总统对立部族的身份召集本部族群体，进而组织起一支数量可观的游行示威队伍，给执政的总统以巨大的政治压力。

### （三）传统政治习俗

吉尔吉斯斯坦虽然独立时间很短，但是其历史却十分悠久。经过长期的历史演进，一些传统政治习俗得以保留至今，并对当今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这些传统政治习俗既包括以图甘切利克（Tooganchilik）为代表的对吉尔吉斯人所尊崇的传统政治文化或行为准则，也包括以阿克萨卡尔（Aksakal）和帕尔万（Palvon）为代表的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生活产生独特影响的政治角色或政治群体，更包括以忽里勒台（Kurultai）为代表的得到吉尔吉斯人广泛认同的历史性政治机构。上述传统政治习俗均被反对派所重视，成为其在发起“革

<sup>①</sup> Aksana Ismailbekova, “Kyrgyzstan Country Report Part 2 Micro-Level: Informal Governance and Corruption – Transcending the Principal Agent and Collective Action Paradigms”, Basel Institute on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 July 2018, pp. 7 – 10.

命”过程中进行政治动员、获取道义支持的手段和工具。

1.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吉尔吉斯斯坦形成了独特的图甘切利克文化。图甘切利克的本意是“团结”，即每个吉尔吉斯人都有义务成为一名士兵，帮助他的社区成员，或是为他的社区成员报仇<sup>①</sup>。图甘切利克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社会文化、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但是增进一个部族或社区内部凝聚力的重要精神要素，也是帮助政治家们获取民众支持、发起政治动员的重要政治工具。这种独特的图甘切利克文化被反对派领导人所利用，成为吉尔吉斯斯坦“革命”中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由于很多反对派政治领袖在其所在部族或地区享有较高威望，因此他们一旦以图甘切利克作为口号来对其族群发起动员，往往就会调动起当地民众的情绪并以此获得大量民众支持。

2. 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萨卡尔同样对其社会乃至政治风貌产生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阿克萨卡尔的原意为“长着白胡子的老人”，但在研究阿克萨卡尔的政治学或社会学意义时，往往采用其引申义，即“基层社会中老年长且有威望的人”。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各个部族中，均有尊奉长者的社会规范，年长的人在其社会中具有很高的权威。阿克萨卡尔利用他们的权威在社区中维持社会控制，谴责（Uiat）和祝福（Bata）是阿克萨卡尔们在族群中建立威信的手段。由于阿克萨卡尔们在吉尔吉斯斯坦民众中具有崇高威望，所以反对派在进行政治动员时格外重视对阿克萨卡尔们的联络和拉拢。而且，很多反对派领导人物自身便是阿克萨卡尔，他们在发起“革命”时也重视对这一身份的利用。

3. 由于帕尔万所处的社会地位较高，所以当帕尔万们发表自己的声音，乃至参与政治活动时，往往能够得到较多民众的响应。在吉尔吉斯语中，帕尔万意为“摔跤手”，而在当代的吉尔吉斯斯坦社会，帕尔万往往被引申为强壮、好斗的男子，他们不但孔武有力，而且高贵和正义。帕尔万们通常会自发地形成行业协会或行业联盟，当他们参与政治活动时，其背后依托的行业协会或行业联盟会采取集体行动，从而制造出更大的声势。在“郁金香革命”期间，反对派领导人物之一埃尔金巴耶夫即利用其帕尔万的身份，召集众多同行以及民众进行游行示威，对政府制造了巨大压力。

4. 忽里勒台是中亚地区非常古老的一个政治制度。在吉尔吉斯斯坦，忽里

---

<sup>①</sup> Azamat Temirkoulov, “Tribalism, Social Conflict, and State – Building in the Kyrgyz Republic”, *Berliner Osteuropa Info*, No. 21, 2004, p. 96.



勒台制度可以追溯到操突厥语民族和蒙古人统治中亚的时代<sup>①</sup>。召开忽里勒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选举新汗以及作出重要的决定，包括帝国行政区划的重组、新的税收法律的制定、部队的派遣，等等<sup>②</sup>。忽里勒台在中亚地区存在了数百年，其性质逐渐由游牧部落贵族进行政治决策的机构转变为进行国家决策的国民议会。苏联时期，这一机构并没有像其他许多传统政治机构那样受到苏联当局的压迫。苏联解体后，忽里勒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影响力又有所恢复。鉴于忽里勒台对吉尔吉斯斯坦人民的特殊意义，自阿卡耶夫以来，历届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都十分重视对忽里勒台的控制，以达到利用忽里勒台为政府的合法性背书的目的。2005年2月5日，阿卡耶夫组织了其执政期间的最后一次全国忽里勒台会议，其目的在于巩固自身执政地位，以及为即将到来的2005年议会大选抢占舆论高地。2010年3月，巴基耶夫也组织了其执政期间的最后一次忽里勒台会议，根据巴基耶夫在访谈中的回忆，与会代表作出了支持巴基耶夫及其改革路线的决议<sup>③</sup>。但是，吉尔吉斯斯坦当局利用忽里勒台来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做法并没有收到足够的成效。一方面，人民对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召开的忽里勒台并不信任，甚至对政府控制和干预忽里勒台的做法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情绪。另一方面，政府对忽里勒台的操控，并没有削弱反对派在忽里勒台中的影响力。忽里勒台除了在全国范围内设立总忽里勒台之外，在各个州乃至城市、部落都设有忽里勒台。反对派在这些地方性忽里勒台中仍然有很强的影响力，这为后来反对派利用忽里勒台来加速实现反政府动员提供了基础。

综上所述，传统政治习俗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传统政治习俗的根基来自于广大民众的认可，所以这些传统政治习俗往往能够独立于正式政治制度而发挥作用。而这一点，也被反对派所广泛利用，成为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对于不同类型的传统政治习俗，反对派有着不同的运用策略。对于以图甘切利克为代表的政治文化或行为准则来说，其主要作用在于帮助反对派获得道义支持，以及依据政治文化或行为准则来对参与政治运动的民众进行口头褒奖，从而激起人们的政治热情。对于以阿克萨卡尔和帕尔万为代表的政治角色或政治群体来说，其主要作用在于为反对派的政治动员提供中间联络

<sup>①</sup> <https://eurasianet.org/kyrgyzstan-is-another-layer-of-democracy-too-much-for-bishkek>

<sup>②</sup> Syzdykova, Zhibek and Kalybek Koblandin, “Specifics of State Structures of the Mongol Empire/Detalles de las estructuras estatales del imperio Mongol”, *Utopía y Praxis Latinoamericana*, Vol. 25, No. S7, 2020.

<sup>③</sup>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0/4/12/interview-kurmanbek-bakiyev>

者，并依托这些中间联络者的政治号召力来赢得更广泛的民众支持。对于以忽里勒台为代表的传统政治机构来说，其主要作用在于帮助反对派赢得政治合法性，通过对这些传统政治机构的组织运行或重新启用，反对派得以发布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实现动摇原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增加自身政治合法性的目的。

### 三 反对派利用三种非正式政治力量进行政治动员的过程

根据本文的假设，在吉尔吉斯斯坦三次“革命”中，反对派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有效的政治动员，是由于其充分地利用了个人政治关系网络、部族认同及部族群体、传统政治习俗这三种非正式政治力量。通过对这三种非正式政治力量的运用，吉反对派成功地实现了募集资金、动员支持者、制造舆论压力、争取政治合法性、博取基层力量支持等一系列政治目标，从而在缺乏一系列其他条件的情况下仍然实现了高效的政治动员。下面将以吉尔吉斯斯坦的历次“革命”作为研究案例，对反对派利用三种非正式政治力量进行政治动员的过程进行梳理，并分析这些非正式政治力量在吉尔吉斯斯坦三次“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以验证文章的假设。

#### （一）“郁金香革命”中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过程

“郁金香革命”期间，反对派对个人政治关系网络、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传统政治习俗等非正式政治力量均有比较充分的利用，从而在短时间内实现了高效的政治动员。

首先，反对派领导人物大量运用自己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进行政治动员。这其中，巴基耶夫和库洛夫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 2004 年 11 月，西迪科夫等人就已游说巴基耶夫组建了反对阿卡耶夫的政治集团<sup>①</sup>。“郁金香革命”爆发后，巴基耶夫利用自己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在南方地区进行了大量政治动员。至 2005 年 3 月底，已有数千支持者随巴基耶夫走上街头，他们手持国旗，戴着粉红色和黄色头带，要求阿卡耶夫下台<sup>②</sup>。库洛夫对个人政治关系网的运用有所不同，在“郁金香革命”前夕，库洛夫的助手阿利耶夫即作为代表

---

<sup>①</sup> Alexander Kapatadze, “Political – criminal – business nexus in Georgia and Kyrgyzstan Comparative analysis”, *Research Fellows New*, Bishkek: Social Research Centr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 p. 4.

<sup>②</sup> Jeremy Lennard, “Opposition ‘in control’ in Kyrgyzstan”, March 24, 2005.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5/mar/24/jeremylennard1>

之一参加了反对派与阿卡耶夫之间的会谈，会谈中阿利耶夫提出了进行政治改革、释放库洛夫等政治要求<sup>①</sup>。“郁金香革命”爆发后，阿利耶夫带领支持者从监狱中释放了库洛夫，并在采访中称：“我们已经营救了库洛夫，他很快会在电视上发表讲话”<sup>②</sup>。库洛夫还被反对派组成的临时政府任命为安全部队的负责人<sup>③</sup>。随后，库洛夫的助手库达贝格涅诺夫积极参与了比什凯克民兵志愿巡逻队的组建工作，并负责库洛夫的安全保障工作<sup>④</sup>。巴基耶夫、库洛夫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建立起了政治动员系统，这些动员系统的成员又进一步发动他们身边所熟悉的人群加入抗议，从而动员起了庞大的游行示威队伍，并且初步地实现了建立新政治机构、组建安全部队、维护社会治安等政治目标。

除巴基耶夫和库洛夫之外，诸多其他反对派政治人物也利用了其个人政治关系网络进行了政治动员。纳扎拉利耶夫是比什凯克的一名有影响力的医生，他在“郁金香革命”期间发表文章、散发小册子，并录制了支持反对派的广播公告，鼓励人们抗议，并指责阿卡耶夫试图“愚弄”国民<sup>⑤</sup>。巴里克塔巴索夫也动员其支持者冲进比什凯克的一座政府大楼，抗议他被排除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之外<sup>⑥</sup>。埃尔金巴耶夫也动员起大约两千名拳击手和摔跤手参与了游行示威<sup>⑦</sup>。此外，梅利斯·埃希马卡诺夫（Melis Eshimakanov）、库巴特贝克·拜博洛夫（Kubatbek Baibolov）、特克巴耶夫、奥通巴耶娃、别克纳扎罗夫也都参与了对

① Sultan Jumagulov, “Kyrgyzstan: Embattled Akaev to Share Powers”, February 21, 2005. <https://iwpr.net/global-voices/kyrgyzstan-embattled-akaev-share-powers>

② Jeremy Lennard, “Opposition ‘in control’ in Kyrgyzstan”, March 24, 2005.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5/mar/24/jeremylennard1>

③ Scott Parrish and Margarita Sevcik, “Kyrgyzstan Government Ousted”, March 24, 2005. <https://nonproliferation.org/kyrgyzstan-government-ousted/>

④ Vladimir Pirogov, “Kyrgyz opposition leader Felix Kulov and his close supporter Usen Kudaibergenov”, Alamy Stock Photo, April 9, 2005. <https://www.alamy.com/kyrgyz-opposition-leader-felix-kulov-1-and-his-close-supporter-usen-kudaibergenov-are-seen-in-this-april-9-2005-file-picture-in-bishkek-chairman-of-kyrgyzstans-stuntmens-league-and-well-known-public-figure-kudaibergenov-was-shot-dead-in-bishkek-on-sunday-evening-kyrgyz-law-enforcement-sources-told-interfax-on-sunday-kudaibergenov-was-actively-involved-in-forming-voluntary-civilian-militia-patrols-in-bishkek-on-march-24-and-25-to-provide-protection-from-looters-following-the-coup-that-toppled-former-president-askar-akayev-reutersvladimir-pirogovfile-photo-asaa-image375804665.html>

⑤ David Gullette, *The Genea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Kyrgyz Republic: Kinship, State and “Tribalism”*, Global Oriental, 2010, p. 26.

⑥ Ibid., p. 27.

⑦ Alexander Kupatadze, “Organized Crime before and after the Tulip Revolution: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Upperworld – underworld Networks”, in Sally N. Cummings, edi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Kyrgyzstan’s ‘Tulip Revolution’: Motives, Mobilization and Meaning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 63.

“郁金香革命”的政治动员<sup>①</sup>。总之，参与“郁金香革命”的反对派政治人物数量众多，他们依托其庞杂的个人关系网络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动员起来了相当规模的游行示威队伍，对阿卡耶夫政府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其次，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也被反对派所广泛运用，对“郁金香革命”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极大地加快了反对派政治动员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南方部族的力量扮演了重要角色。巴基耶夫、马萨利耶夫、西迪科夫等南方部族的政治领袖组成了反对阿卡耶夫的政治同盟，他们鼓动本部族群众进行游行示威甚至组建自己的私人武装，极大地增强了反对派政治动员的能力。这导致“郁金香革命”中南方地区的抗议规模要远远大于北方地区的抗议规模。至2005年3月19日，在比什凯克的抗议者大约有3 000人，而在贾拉拉巴德的抗议者则有5万人之多，即使政府在3月20日派遣部队镇压了贾拉拉巴德地区的抗议者，但抗议者又能够很快重新集结并派遣约1 700名骑兵驻守在贾拉拉巴德郊区<sup>②</sup>。

最后，图甘切利克、阿克萨卡尔、帕尔万、忽里勒台等传统政治习俗也在“郁金香革命”的政治动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05年3月15日，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联盟在贾拉拉巴德组织了一场全国性的忽里勒台，主要的反对派均参加了此次会议，3月19日，31名反对派领导人又在奥什市组织了另一次忽里勒台<sup>③</sup>。与此同时，3月15日，一名阿克萨卡尔在贾拉拉巴德进行演说并与当地政府进行谈判，而当政府拒绝与阿克萨卡尔进行谈判时，当地的民众便被激怒，一名受访者表示：“如果阿克萨卡尔都被政府所拒绝，那我们这些普通人还能指望政府做什么呢？”<sup>④</sup>这种民众的怒火在政府安全部队袭击了一些阿克萨卡尔后更加强烈，人们纷纷喊出“人民的儿子不会打自己的阿克萨卡尔”的口号，使这支抗议队伍带有了很强烈的复仇情绪<sup>⑤</sup>。反对派利用传统政治习俗发起政治动员的最突出案例当属埃尔金巴耶夫对于其身边的帕尔万们的动员，由于埃尔金巴耶夫本人便是一名帕尔万，并且他掌管的艾利什（Alysh）搏击协会供养着大量的

<sup>①</sup> Erica Marat, “Kyrgyz NGOs Call on Government to Fight Organized Crime”,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April 11, 2006.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kyrgyz-ngos-call-on-government-to-fight-organized-crime/>

<sup>②</sup> Erica Marat, *The Tulip Revolution: Kyrgyzstan One Year After*, Washington D. C.: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2006, p. 124.

<sup>③</sup> Azamat Temirkulov, “Informal Actors and Institutions in Mobilization: The Periphery in the ‘Tulip Revolution’”,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27, Nos. 3-4, 2008, p. 325.

<sup>④</sup> Azamat Temirkulov, “Informal actors and institutions in mobilization: The periphery in the ‘Tulip Revolution’”,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27, Nos. 3-4, September-December 2008, p. 322.

<sup>⑤</sup> Ibid., p. 322.

拳击手和摔跤手，所以当埃尔金巴耶夫发起反对阿卡耶夫的政治游行时，几乎毫不费力地便召集了两千多名帕尔万来到比什凯克进行游行示威，他们的到来大大增强了反对派的声势<sup>①</sup>。

综上所述，在“郁金香革命”期间，反对派所掌握的三种非正式政治力量——个人政治关系网络、部族认同及部族群体、传统政治习俗均发挥出重要作用。利用这三种非正式政治力量，反对派得以在自身政党建设水平较低、网络及媒体宣传相对缺乏情况下完成高效政治动员，最终实现推翻阿卡耶夫的政治目标。

## （二）“二次革命”中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过程

在“二次革命”过程中，反对派同样大量利用个人政治关系网络、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传统政治习俗进行政治动员。与“郁金香革命”的政治动员相比，反对派利用三种非正式政治力量进行政治动员的手段更加娴熟，而且这三种用以进行政治动员的非正式政治力量也发生了内部成分的变化。

首先，个人政治关系网络在反对派政治动员的过程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郁金香革命”不同的是，特克巴耶夫、奥通巴耶娃、阿坦巴耶夫主导了“二次革命”的政治动员。2010年4月6日，“阿塔·梅肯”党（Ata Meken Party）副主席、特克巴耶夫的主要政治伙伴舍尔尼亚佐夫（Bolot Sherniazov）因参加反对巴基耶夫的集会而被政府逮捕<sup>②</sup>。舍尔尼亚佐夫的被捕成为“二次革命”爆发的导火索，一些“阿塔·梅肯”党的成员以及对政府不满的民众对政府的这一行为进行抗议，并与政府的安全部队发生了短暂的冲突。4月7日，被政府释放的特克巴耶夫带领一些“阿塔·梅肯”党的成员和他的支持者走上街头，继续抗议政府的暴力行为<sup>③</sup>。随后，奥通巴耶娃、特克巴耶夫、阿坦巴耶夫等人宣布组建临时政府<sup>④</sup>。阿坦巴耶夫、萨利耶夫（Temirbek Sariyev）、奥通巴耶娃等人又前往俄罗斯，寻求外交上的支持<sup>⑤</sup>。在局势已经基本明朗后，吉尔吉

<sup>①</sup> Alexander Kupaatdze, “Organized Crime before and after the Tulip Revolution: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Upperworld – underworld Networks”, in Sally N. Cummings, edi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Kyrgyzstan’s “Tulip Revolution”: Motives, Mobilization and Meaning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 63.

<sup>②</sup> Azamat Temirkulov, “Analysis of Current Events – Kyrgyz ‘Revolutions’ in 2005 and 20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ss Mobilization”,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38, No. 5, September 2010, p. 597.

<sup>③</sup> “April 7 Memorial Morphs into Political Rally”, April 7, 2010. <https://eurasianet.org/kyrgyzstan-april-7-memorial-morphs-into-political-rally>

<sup>④</sup> Kyrgyzstan Inquiry Commission,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Events in Southern Kyrgyzstan in June 2010”, 2011, p. 13.

<sup>⑤</sup> Wojciech Górecki, “Russia’s position on the events in Kyrgyzstan (April – June 2010)”, *OSW Commentary*, No. 38, 2010, p. 4. [https://www.osw.waw.pl/sites/default/files/commentary\\_38\\_0.pdf](https://www.osw.waw.pl/sites/default/files/commentary_38_0.pdf)

斯斯坦南部仍然有少部分巴基耶夫的支持者与临时政府进行对抗。为此，特克巴耶夫的弟弟阿什利别克·特克巴耶夫（Asylbek）带领“阿塔·梅肯”党的部分成员前往贾拉拉巴德维护当地的安全秩序<sup>①</sup>。

其次，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仍然是反对派用以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但与“郁金香革命”不同的是，“二次革命”中反对派主要依靠北方部族的支持来进行政治动员。这一点可以从“二次革命”后的一份调查中得到佐证，调查显示，虽然三分之二的北方人将巴基耶夫的垮台归因于“绝望的人群的自发起义”，但只有15%的南方人同意这一说法<sup>②</sup>。北方部族反对巴基耶夫的主要原因仍然是缘于巴基耶夫对南方部族利益的过分偏袒。巴基耶夫在其执政期间，任命了大量来自其家族和故乡的人员担任政府要职，这使得吉尔吉斯斯坦政坛在巴基耶夫统治期间为南方部族所把控，从而引起了北方部族的政治力量的不满。奥通巴耶娃、库洛夫、阿坦巴耶夫、巴巴诺夫等最初支持巴基耶夫的政治人物逐渐站到了巴基耶夫的对立面，并利用吉尔吉斯斯坦北方部族的力量来反对巴基耶夫。在“二次革命”期间，北部的塔拉斯州和纳伦州是反对派夺取控制权的最初地区。反对派运动随后席卷首都，巴基耶夫很快下台。

最后，传统政治习俗对此次“革命”仍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与“郁金香革命”不同的是，“二次革命”过程中忽里勒台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在“二次革命”前夕，2010年3月17日，反对派举行了一次忽里勒台，向当局提出了7点最后通牒，其中包括要求巴基耶夫家族下台，恢复私有化的国有企业以及降低关税<sup>③</sup>。由于政府不愿回应反对派的要求，反对派决定于2010年4月7日在全国各地举行忽里勒台。当舍尔尼亚佐夫在前往塔拉斯地区进行忽里勒台的准备工作时，政府逮捕了他，这件事更加激起了民众的愤怒，抗议人群迅速占领了办公大楼，挟持了高级军官<sup>④</sup>。此时，安全部队已经无法控制局面，抗议人群越来越多。当天，反对派占领了科布尼（Kerbene）的政府大楼，并在随后通过当地的

<sup>①</sup> Kyrgyzstan Inquiry Commission,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Events in Southern Kyrgyzstan in June 2010”, 2011, p. 14.

<sup>②</sup> “Recurring Themes in the Kyrgyz Revolutions”, October 20, 2011. <https://geohistory.today/recurring-themes-kyrgyz-revolutions/>

<sup>③</sup> Azamat Tmirkulov, “Kyrgyz ‘Revolutions’ in 2005 and 20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ss Mobilization”,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38, No. 5, September 2010, p. 596.

<sup>④</sup> *Ibid.*, p. 597.

忽里勒台选举出了新的领导集体<sup>①</sup>。2010年4月7日晚上，抗议者把反对派领导人从国家安全局的监狱中里释放出来，并带领他们上台。可以看出，忽里勒台在“二次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二次革命”的导火索，也是反对派形成新的领导集体、宣布自己合法性的重要工具。

综上所述，在“二次革命”中，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仍然热衷于通过非正式政治力量，尤其是个人政治关系网络来实现政治动员。当然，与“郁金香革命”时的政治动员相比，反对派在“二次革命”中的政治动员更加迅速，其进行政治动员的依托力量也发生了细微变化。在反对派利用个人政治关系网络进行动员的过程中，特克巴耶夫、奥通巴耶娃、阿坦巴耶夫已经成为政治动员的主导人物。在反对派利用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进行政治动员的过程中，其主要依托力量也从南方部族转变为了北方部族。在反对派利用传统政治习俗进行政治动员的过程中，忽里勒台发挥了更为突出和重要的作用。

### （三）“2020年政治运动”中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过程

在“2020年政治运动”中，反对派仍然充分利用了他们所掌握的非正式政治力量，在短时间内即实现了广泛而有效的政治动员。

首先，反对派仍然大量依托个人关系网络进行政治动员。在2020年10月4日的议会选举结束后，诸多反对派领导人物如特克巴耶夫、巴巴诺夫、托克托加齐耶夫（Tilek Toktogazyev）等人即开始组织民众进行游行示威。不过，阿坦巴耶夫和扎帕罗夫两人的支持者很快成为了游行示威的主力。10月6日，阿坦巴耶夫被支持者从监狱中释放，并在支持者的簇拥下前往阿拉太广场发表演讲<sup>②</sup>。阿坦巴耶夫的政治伙伴图尔杜库夫（Adil Turdukuov）、尼亚佐夫（Miroslav Niazov）以及阿坦巴耶夫的儿子塞伊特·阿坦巴耶夫等人都加入了游行示威队伍。另一方面，扎帕罗夫也被其支持者从监狱中释放。之后，扎帕罗夫将他的主要政治盟友塔西耶夫、马米托夫、托克托苏诺夫（Sharabidin Toktosunov）等人任以政府要职。扎帕罗夫的这些政治伙伴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不但急需帮助扎帕罗夫组织民众进行游行示威，而且接管了吉尔吉斯斯坦的安全部门，成为日后帮助扎帕罗夫压制政治对手、获取最高权力的重要力量。

---

<sup>①</sup> Alexey Petrov, “Where to Now with the Kurultai Movement in Kyrgyzstan?”, April 9, 2010. <https://www.marxist.com/where-to-now-with-kurultai-movement-kyrgyzstan.htm>

<sup>②</sup> “Kyrgyzstan’s election commission invalidates parliamentary vote results after protests”, October 6, 2020. <https://www.france24.com/en/20201006-kyrgyzstan-s-election-commission-invalidates-vote-result-amid-unrest>

其次，反对派继续利用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帮助自己实现政治动员。由于出身于南方部族的热恩别科夫已在 2017 年当选为总统，因此 2020 年的“革命”中反对派仍然是以北方部族作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力量。据杜洛特科尔迪耶娃（Asel Doolotkeldieva）的研究，伊塞克湖地区的民众在此次政治运动中占了很大比例<sup>①</sup>。而伊塞克湖地区正是反对派领导人扎帕罗夫的故乡。比什凯克的评论员亚历山大·克尼亚泽夫（Alexander Knyazev）也认为，这是各省和部族之间的一次典型冲突<sup>②</sup>。因此，在 2020 年的政治运动中，部族因素仍然是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所依托的重要力量。不过，相比“郁金香革命”和“二次革命”，部族因素对“2020 年政治运动”的影响的确已相对减弱。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扎帕罗夫作为此次政治运动的最终胜出者，其出身属于北方部族，但他却长期在南方地区从事政治活动，而且他的最主要政治盟友塔西耶夫也出身于南方部族。

最后，反对派仍然重视利用忽里勒台等传统政治习俗来为此次政治运动背书和造势。一方面，阿克萨卡尔等传统政治身份仍然被反对派所重视和利用，在阿克萨卡尔的鼓舞下反对派能够召集更多的支持者。塔西耶夫甚至联络激进的民族团体“四十骑士团”（Kyrk Choro）为政治运动造势<sup>③</sup>。另一方面，忽里勒台等传统政治机构仍然在此次“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 年 10 月 29 日，以“宪政改革刻不容缓”为主题的全国性的忽里勒台在比什凯克举行。会议的议题包括：10 月 5~6 日事件后的国家局势及其出路，向人民统治过渡的迫切性，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地方自治的发展，等等<sup>④</sup>。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以及阿卡萨尔人委员会等都参加了此次活动。与之前两次反政府运动相比，2020 年反政府运动对忽里勒台的运用已经发生于原政府倒台之后，因此，此次忽里勒台的作用主要是确认革命成果以及尽快确定新政府的合法性。

综上所述，在“2020 年政治运动”中，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仍然注重利用个人政治关系网络等非正式政治力量来进行政治动员。但与“郁金香革命”和

<sup>①</sup> Asel Doolotkeldieva, “The 2020 Violent Change in Government in Kyrgyzstan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Three Distinct Stories in One”, in Anja Mihr Ed., *Between Peace and Conflict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Studies o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OSCE Region*, p. 165.

<sup>②</sup> Zaki Shaikh, “Tussle between Provinces, Clans Annuls Kyrgyzstan Poll Results”, Anadolu Agency, October 9, 2020. <https://www.aa.com.tr/en/analysis/analysis-tussle-between-provinces-clans-annuls-kyrgyzstan-poll-results/2001042>

<sup>③</sup> Temur Umarov, “Who’s In Charge Following Revolution in Kyrgyzstan?”, October 16, 2020. <https://carnegiemoscov.org/commentary/83046>

<sup>④</sup> “Bishkek Hosts People’s Kurultai in Support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October 29, 2020. <http://en.kabar.kg/news/bishkek-hosts-peoples-kurultai-in-support-of-constitutional-reform/>



“二次革命”相比，反对派在“2020年政治运动”中进行政治动员的依托力量还是发生了些许变化。其一，随着吉尔吉斯斯坦主要反对派政党建设的不断完善，政党在“2020年政治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较之以往有了一定的提升，除社会民主党、“阿塔·梅肯”党之外，一些新兴政党如“比尔·波尔”党（Bir Bol Party，意为“团结”）和布顿党（Butun Party，意为“联合”）也组织了部分民众参与抗议，对于当时的政治局势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二，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传统政治习俗等非正式政治力量虽然仍被反对派所运用，但它们对于“革命”进程的影响已经大大下降，反对派在“2020年政治运动”中的政治动员主要依托其政治人物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来完成。其三，个人政治关系网络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运动的影响也在发生变化。在“2020年政治运动”中，一些老一代的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人物如库洛夫、特克巴耶夫、奥通巴耶娃、埃尔克巴耶夫等的影响已经十分微弱，而以扎帕罗夫为代表的新一代政治人物正在快速崛起。由于目前在国家中拥有最强个人政治关系网络的扎帕罗夫已经成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所以，上述趋势如果能够继续保持，则吉尔吉斯斯坦频繁发生“革命”的现象就有可能在扎帕罗夫任期内得到终结。

#### 四 吉尔吉斯斯坦非正式政治力量的动员机制

通过以上对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三种非正式政治力量及其在吉三次“革命”中所扮演角色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吉尔吉斯斯坦历次“革命”前夕，反对派均掌握着大量非正式政治力量，这种非正式政治力量在“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有效地促成了反对派的政治动员。

首先，通过对非正式政治力量的运用，反对派动员了大量支持者进行游行示威，给总统以巨大的政治压力。对于很多民众来说，反对派领导人首先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同乡、部族族人及受人尊敬的阿克萨卡尔，在这些身份之后，才是政治运动的发起者。因此民众在政府与反对派之间进行权衡的时候，更愿意支持自己较为熟悉的各反对派领导人或组织者，而不愿意支持陌生的甚至是对民众不友好的政府（除非这部分民众本身就与政府的领导人存在非正式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非正式政治力量很好地帮助反对派同民众拉近距离、博取民众的支持。有些时候，利用非正式政治力量，反对派领导人甚至只需要经过简单的一到两个中间环节就可以对最基层的民众施加政治影响。这极大地提高了反对派对民众进

行政动员的效率。三次“革命”中，反对派均通过非正式政治力量动员了数万人参加游行示威，考虑到吉尔吉斯斯坦的总人口并不多，因此这些动员起来的支持者已经足以给政府制造巨大的政治压力。

其次，通过对非正式政治力量的运用，反对派得以募集资金、获取信息。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是羸弱的，他们既缺乏资金，也缺乏获取信息的渠道。但反对派利用非正式政治力量弥补了这一缺点。很多反对派领导人，如巴基耶夫、阿坦巴耶夫、扎帕罗夫等等，都有办企业经历，或是与企业家有较好的私人关系。在吉政局发生变动时，这些反对派领导人能够利用他们与企业家的私人关系募集到大量资金。同时，反对派领导人大多都有担任政府高层职务的经历，即使这些政府职务因为种种原因被总统剥夺，但由此形成的政治关系网却可以长期存在。利用这一因素，反对派领导人得以暗中与政府中的高官进行联络，从而获取信息，甚至策动政府高官倒戈。例如，在“郁金香革命”期间，反对派领导人得到了安全部队长官尼亚佐夫（Miroslav Niazov）的建议，即反对派应该从纳伦州和塔拉斯州开始动员<sup>①</sup>。另外，亚历山大·克尼亚泽夫（Alexander Knyazev）称，在他与阿卡耶夫的讨论中得到消息，内务部、国防部和安全部门的一些负责人正在与反对派领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谈判<sup>②</sup>。

再次，通过对非正式政治力量的运用，反对派得以争取更多的舆论支持。在反对派所掌握的非正式政治力量中，有两支力量对于反对派争取合法性给予了帮助。其一是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吉尔吉斯斯坦深受部族政治的影响，而很多反对派领导人出身于总统的对立部族。在发起政治运动时，反对派领导人往往利用自己的族群身份，争取本部族族人对自己的支持，并激起本部族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其二是以忽里勒台为代表的传统政治机构。忽里勒台等传统政治机构在吉尔吉斯斯坦民众中具有较高威望，且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程度的立法功能。通过对忽里勒台等传统政治机构的利用，反对派得以在削弱政府合法性的同时，为自己的政治运动赢得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

最后，非正式政治力量使得反对派更加隐蔽，从而使政府在打击、削弱、镇

<sup>①</sup> 这一信息是学者特米尔库洛夫（Azamat Temirkulov）在对伊萨耶夫的采访中得到的。参考：Azamat Temirkulov, “Analysis of Current Events – Kyrgyz ‘Revolutions’ in 2005 and 20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ss Mobilization”,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38, No. 5, September 2010, p. 597.

<sup>②</sup> Azamat Temirkulov, “Informal actors and institutions in mobilization: the periphery in the ‘Tulip Revolution’”,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27, Nos. 3–4, September–December 2008, p. 329.

压反对派的过程中面临更大障碍。通常来说，为了削弱反对派的力量、防止反对派发动政变，政府通常会采取取缔政党、逮捕反对派领导人、查封反对派出版物等手段。但由于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的联络往往通过个人政治关系网络，其进行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来自非正式政治力量，所以政府的上述手段并不能取得好的效果。以热恩别科夫政府为例，在2020年政治运动前夕，阿坦巴耶夫、特克巴耶夫、扎帕罗夫等反对派领导人均被关押在监狱中，但这并不妨碍反对派利用其地下网络去组织和发动政变。

综上所述，非正式政治力量在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对非正式政治力量的运用，反对派有效地克服了正式政治力量不足以及发起政治动员“常见”条件相对缺失所带来的一系列困难，实现了募集资金、召集支持者、获取舆论支持、削弱政府合法性、策反政府高层官员等一系列政治目标，进而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有效的政治动员。

## 结 语

在吉尔吉斯斯坦历次“革命”中，反对派通过对个人政治关系网络、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传统政治习俗这三支非正式政治力量的运用，实现了广泛而高效的政治动员，它影响乃至决定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的现象值得深思。只要这种非正式政治力量在吉尔吉斯斯坦长期存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便始终存在不稳定因素，一旦反政府运动的收益足够高，反对派便倾向于发动反政府运动。如何制约这种非正式政治力量对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治的过度干预，如何实现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的稳定良序发展，成为日后需要研究的课题。

那么，如何应对这种非正式政治力量对吉政局的影响，吉政局的未来发展将走向何方？

首先，吉未来政局能否克服非正式政治力量的不利影响，实现政局的平稳有序发展，将主要取决于能否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在吉尔吉斯斯坦缺乏优良的政治传统，其政治转型也屡次遭遇挫折的情况下，只有当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出现，且能够实现权力的集中后，吉尔吉斯斯坦的非正式政治力量才能被抑制在合理区间内。这对吉未来的领导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且，这一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在实现集权后，还应克服对权力的欲望，将权力无保留地交给下一任领导人，如此，才能保证继任者同样能压制非正式政治力量，并且保证吉政治局势不

会因前任领导人的离去而发生动荡。为此，未来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运作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权力交接问题。既要防止继任者权力过大，也要防止继任者权力过小。如果继任者权力过大，则有可能在权力交接之前即与现任领导者产生权力冲突；如果继任者权力过小，则有可能出现继任者在权力交接后无法有效掌控政治局势的问题。而且，在权力交接后，仍然需要妥善处理前任者和继任者之间的关系，防止双方因为利益冲突而再次出现政治矛盾。

其次，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对于非正式政治力量的掌握和运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吉未来政治发展的走向。鉴于吉尔吉斯斯坦的特殊国情，可以说，未来的吉总统如果想要实现权力的巩固，就必须加强对非正式政治力量的掌握和运用。唯有此，才能以自身掌握的强大非正式政治力量为后盾，实现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建设向前发展。但这种对非正式政治力量的运用也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就会严重地削弱总统执政的合法性。基于此，吉尔吉斯斯坦如要摆脱政治发展的困境，就需要警惕两种现象的发生，一是裙带关系干预政治，二是部族认同干预政治。然而，扎帕罗夫在执政期间，已经出现了任用亲属接手吉尔加朗（Jyrgalan）煤矿的情况，并且其民族主义的立场也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族群关系更为紧张。因此，未来扎帕罗夫执政之路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稳定之路还存在诸多隐患。

最后，在吉尔吉斯斯坦推进国家政治建设的过程中，也要防范西方势力对其国内政治的干扰。非正式政治力量具有隐蔽性，其对政治局势的影响经常不能被政府有效察觉。而西方国家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局势的干扰往往就是通过非正式政治力量来产生作用的，途径主要包括非政府组织、个人关系、新闻媒体。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防范西方势力利用上述非正式政治力量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渗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吉尔吉斯斯坦已经发生的三次“革命”中，社交网络并未作为一种主要力量被反对派广泛利用，但随着近年来吉尔吉斯斯坦社交网络的快速发展，其网民数量和社交网络团体的规模均明显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的反对派势力很可能利用社交网络这一新工具，谋求对吉发起下一次“革命”。对此值得密切关注。

（责任编辑 于树一）